汉代经学教育述评

俞启定

（北京师大教育系）

汉代经学教育制度的形成

儒家经学成为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儒家经籍最初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统称六经，其中《乐》经早佚，也有人说《乐》本无经，所以实际上只有五经。

古代的今文经学家认为五经全出于孔子之手，古文经学家则认为五经古已有之，孔子只不过是"述而不作"罢了，这两种观点都带有片面性，但孔子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编纂、修订工作，并以此作为教学内容，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因此，五经的产生并在中国封建社会取得独尊的地位，是与孔子的努力分不开的。但在先秦的古籍中，包括儒家学派的《论语》、《孟子》和《荀子》等书中所引用的《诗》、《书》等经籍原文，许多都与汉代以后所通行的经籍不同，可见在孔子之后，编纂整理五经的工作仍在继续。总的来说，五经中的任何一经，都绝非成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同一时期，而是积许多代人的传授、整理和加工而成书的。

孔子以后，五经成为儒家学者所共同尊崇和世代相传的经典，在战国时期始终居于"显学"位置。秦代禁私学和焚书坑儒，给学术文化造成一场浩劫，但经籍并未灭绝，除《易》不属禁书而传授未断之外，还有一些儒生不顾禁令而隐藏了经籍。由于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到公元前191年西汉政府正式废除"挟书律"的时候，许多精通经术的儒生依然健在，因而使儒家经学得以重见天日。

西汉初年，儒家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陆贾劝汉高祖重视《诗》、《书》，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礼仪制度，都大受赞赏。汉文帝任辕固为《诗》博士，还派晁错专程去济南向伏生学习《尚书》。"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①，所以在汉初六七十年间，儒学在政府中地位不高，而经籍的传授也主要是在民间进行的。如申公居家教《诗》，"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伏生于秦代焚书时壁藏《尚书》，"即以教于齐鲁之间"。②这种民间传授不大受政局的干扰，且无利欲的支配，故授受者多怀潜心治学的态度，因而使经籍得以保存和日趋完善。但由于没有政府的扶植，影响有限，常流于自生自灭。如叔孙通的《礼》学，贾谊的《易》学，陆贾的《诗》《书》学，都未能流传于后世。直至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③的政策之后，这种局面才开始

①② 《史记·儒林列传》。

③ 《汉书·武帝纪》。

发生根本变化。

专置五经博士和设博士弟子员的作法，是独尊儒术政策在制度上的集中体现，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博士之称缘起于战国，到秦代成为一种官职。秦朝廷中有七十博士，由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人充任。博士的流品很杂，包括文学、诸子、方术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设博士官的目的在于利用这些人的专长为政治服务，而不是要发展学术，所以秦代博士没有固定的职掌，处于"特备员费用"① 的状况，只是在国家遇到疑难问题时，统治者才召集有关博士，让他们解答疑难，出谋划策。所以，设博士官实际上只是战国养士的官方制度化。汉初，博士的设置与秦代相仿。有的博士也招收弟子进行教学活动，如叔孙通，但这并非朝廷赋予的职责，所以从性质上说，这种教学仍属私学。

公元前 136 年专置五经博士，其他诸子及方术杂流失去了立为博士的资格。从此，依靠学术作为进身之阶的人，只有攻习五经之一途了，这样一来，儒家经术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到至尊的地位。在统一思想的措施上，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使用简单的暴力手段禁止各家学说，而是采取"表章六经"的方式，以官位爵禄诱使人们归宗于儒家经学，如司马迁所说："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②

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根据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此后，博士虽然还保持着参与国家某些政治事务的传统，但其日常的主要职掌就是以经术教授弟子。在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之后，以经学教育为主体的教育制度逐渐形成。博士弟子制导致了封建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产生。太学人数不断扩充，到东汉人数最多时竟达三万人以上。武帝时还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即地方的经学教育负责人，地方官学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官方正式的经学教育推动下，经学家进行私人教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弟子少则数百，多则上万，其总数当大大超过太学和地方官学的学生人数。汉代的经学教育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儒学独尊宣告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但学术思想上的论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重心转移到儒家经学内部。经术既然是进身之阶，也必然成为角逐之地，因此产生了汉代的师法家法与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分。

师法家法与今古文经学的传授系统

恪守师法家法是汉代经学教育的一大特点。

师法一词源出《荀子·儒效》："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这里所说的师法即师承效法之义。西汉以前，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简册，因此书籍是很珍贵的，书籍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口授和传抄。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书本知识的关键在于师传，自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书籍的真实性、学说的权威性，也必须以师承关系为依据。汉武帝初立五经博士，选择的都是师承系统最严密、学术影响最大的学派和经师，即《易》杨何、《尚书》欧阳、《礼》后苍、《春秋》公羊，加上文帝时已立为博士的齐、鲁、韩三家《诗》，这些博士都是当时各经的权威，其师承系统有的可上溯至孔子的嫡传弟子，如《易》为商瞿，《诗》和《公羊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儒林列传》。

春秋》为子夏。颜师古说："有始师乃有师法。"① 这种以宗师为源，以弟子的逐代相传为流，形成了各经学流派的固有体系。宗师的经文和经说就是师法，是后代弟子所共同尊奉的。在汉代，特别是西汉，师法是解释、运用和传授经籍最重要的依据，也是衡量其正确性的基本尺度，可见师法实际上是汉代经学教育的主要学规。由于博士是经学的官方权威，所以博士的师法尤为重要。五经博士都是按特定的经师和学派而设的，可谓师法博士，不仅非博士师传系统的经学家无权染指博士职位，即使是博士的弟子，如果违背师说，也不能充任博士。如孟喜本是博士田王孙的弟子，"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②

恪守师法体现了学有所依的严谨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使经籍得以准确可靠地流传后世的保证，同时也促进人们积极求师问学，增强了尊师重道的学风。但是，师法毕竟代表着学术上狭隘的宗派倾向，它造成了汉代经学严格的门户之分，学者各执其师说，互不通融，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师法总是与己说相对立的，荀子就曾反对过"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荀子·修身》）的人，《后汉书·鲁丕传》云："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但要求弟子恪守师法的结果必然是束缚思想，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在师法兴起之初，司马谈就有"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③的忧虑，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悖，惑也。各习师书，惑于所见也。"王充指出："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④ 尽管"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⑤成为汉代学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陈旧的师说总是要有所更新的。一些优秀的弟子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充实和发展了先师经说，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并获得社会和官方的承认，这就是所谓家法。如孟喜本人虽因改师法而未能当上博士，但他终成一家之学，汉宣帝时与同门施雠和梁丘贺的家学共立为《易》的三家博士。其他各经也都衍生出新的家学：《尚书》有大、小夏侯，《礼》有大、小戴，《公羊春秋》有严、颜二家，均被列为博士官学。施、孟、梁丘《易》取代了原来的杨何《易》，大、小戴《礼》取代了原来的后苍《礼》，欧阳《尚书》保住了博士地位，但其弟子后学的大、小夏侯已与之平分秋色。由此看来，家法的出现是对原有师法的更新，这就是《后汉书·章帝纪》中诏书所说的："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家法各有其特色，如夏侯胜"为学精孰"，以明经术，说灾异，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宗旨，夏侯建治《尚书》则善于"左右采获"、"具文饰说"侧重于细致深入地钻研经文。

家法对于原有的师法来说是一个更新，但这只是在同一师传系统内的发展而已，且家法一旦形成，同样是后代弟子所必须恪守的。东汉时"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⑥，徐防曾上疏严厉指责某些"皆以意说，不修家法，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⑦的博士弟子。东汉的选士制度中明文规定"诸生试家法"⑧，"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⑨。可见家法之严丝毫不比师法逊色。从强调师承、恪守师说的意义上说，家法与师法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均具有死守门户、束缚思想的弊病。特别是占据博士职位的各家学派，更是利用师法家法排斥异己，维持

① 《汉书·外戚传》注。
② 《汉书·儒林传》。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 《论衡·效力》。
⑤ 皮锡瑞：《经学历史》三。
⑥ 《后汉书·儒林传》。
⑦ 《后汉书·徐防传》。
⑧ 《后汉书·左雄传》。
⑨ 《后汉书·质帝纪》。

自己的一统天下。而非博士师传系统的学派也要力求取得官方承认的正宗地位，这样就产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

古文经是西汉中叶之后陆续问世的。如鲁恭王刘余在毁孔子旧宅盖宫殿时，发现壁中藏有《尚书》、《礼记》等数十篇经籍。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集了不少古书，其中有《周官》、《仪礼》等经籍。这些经籍均是用战国时的古文书写的，因而被称为古文经。与此相对应，汉初以来由经师口授编著、后成为博士所职掌的正式的经籍，由于都是用当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因而被称为今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相比，有的是经文基本相同而经说不同，如《毛诗》、《春秋左传》。有的经文本身不同，如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数十篇。有的则完全是为今文所无的经籍，如《周礼》。古文经由于文字难懂，且无师承，难以考证，所以问世后除民间有少数传习者外，大多藏于官方秘府，无人过问。直至西汉末年，刘歆继承父业典校中秘书，在整理秘府图书时发现了这些经籍，于是要求设置古文经博士，遭到当时博士们的一致反对，今古文经学之争从此开始，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早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争立博士官学方面。今文经学要保住唯我独尊的地位，强调的是正统，例如师丹攻击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①。东汉初年范升反对立《左传》，其理由也是"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②。而古文经学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只是要求与今文经学平等的地位，所以强调的是兼容。刘歆在列举汉宣帝将《谷梁春秋》与《公羊春秋》并置博士的事例后指出："文虽相反，犹并置者何也？与其过废也，宁过而立之。"③班固对刘歆倡立古文经博士一事表示了同样的肯定，他说："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④古文经学这种兼容并存的态度显然比今文经学排斥异己的态度要好得多。统治者对两派经学本无固定的偏好，他们所注重的只是政治上的利害得失，而因古文经学力图涉足于博士官学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是不能容许的，所以统治者也乐于维持今文经学的正宗地位。古文经学曾几度立为博士，都因今文经学博士们的强烈反对而很快作罢。

东汉中叶之后，朝政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儒家士大夫受到排斥打击，以至发生绵延数十年的"党锢之祸"，在这种形势下，经学的重心转向民间的学术研究。博士官不再被看作是经学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失去了争夺价值。章帝之后即不复有争立古文经博士之事，所以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成为纯粹的学术之争。古文经学以民间传习为主，与今文经学相比，它的政治色彩较淡而学术气息较浓，不大讲灾异、图谶、微言大义这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内容，而注重于经文的训诂和典章制度的考证，因此在经学上的贡献更大。章帝时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这本是官方经学的学术会议，然而受命撰写会议成果《白虎通义》的却是倾向于古文经学的班固。安帝时的东观校书，参加者除五经博士外，还有许慎、马融等古文经学家。由此可见，古文经学虽未能占据博士职位，但在学术上已经形成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

古文经学的兴起与今古文经学之争对汉代恪守师法家法的学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古文经多为久不见于世的秘藏古籍，所以没有师传系统，如马融《尚书序》说："逸书十六篇，绝无师说。"既无师说，也就没有师法家法可言，这就成为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后汉书·陈元传》。
③ 《汉书·楚元王传》。
④ 《汉书·儒林传赞》。

文经学的主要理由之一。早在刘歆提倡古文经学之始，公孙禄就指责他"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① 范升反对立《左传》为博士，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左氏不祖于孔子而出自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② 而刘歆抨击今文经博士"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③，则是最早公开反对师法家法的言论。所以是否应当恪守师法家法，就成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教育日益昌盛，由于基本上是在民间传授，无需象博士官学那样注重师法家法。学者以研究学问为宗旨，多能广泛求师，如班固"所学无常师"④，贾逵曾从刘歆、涂恽、谢曼卿等多人受业，马融自称"少而好问，学无常师"⑤，郑玄更是游学在外近二十年，遍访名师大儒。学业既无固定的师传，则不可能有一定的师法家法可循。东汉时纸的广泛使用，为自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师传的必要性降低了。今文经学各学派为抵制共同的对手——古文经学，也有必要拆除内部的宗派藩篱，因此今文经学内部的师法家法也逐渐削弱。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其所安。"虽因不守家法而未当上博士，但"诸儒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⑥ 在太学的博士弟子中形成"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⑦的风气，以至徐防、左雄等人强烈要求采取制约措施，然而师法家法的束缚是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

经学由分立到统一

东汉今古文经学两派是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的。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广征博引，但决不引《左传》一个字；贾逵、马融等人注释《周礼》、《左传》，也决不用今文经说。门户之见依然存在，但与西汉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西汉学者大多专攻一经，各守一家之师说，学派之间少有联系和交流，评价经说主要看其是否恪守师法家法，而不是经说内容的优劣。东汉经师则普遍兼通数经，甚至兼通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学说观点，如：卢植"能通古今学"。⑧贾逵"弱冠能诵《左氏传》"，"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⑨李育"少习《公羊春秋》，又"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⑩正因为相互了解，所以能够扬己之长，攻彼之短。贾逵上奏"《左传》三十事尤著明者"，主张立《左传》学官。李育则作"难《左传》四十一事"进行抨击。何休"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⑪郑玄则作《发墨守》、《锢膏肓》、《起废疾》予以反驳。尽管这种争论常常带有党同伐异的成分，但毕竟属于学术论争的性质。它密切了学派之间的联系，促使各派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同时也为学派之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儒家经学内部各学派则基本上采取兼容态度。

---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后汉书·范升传》。
③ 《汉书·楚元王传》。
④ 《后汉书·班固传》。
⑤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
⑥⑩⑪ 《后汉书·儒林传》。
⑦ 《后汉书·徐防传》。
⑧ 《后汉书·卢植传》。
⑨ 《后汉书·贾逵传》。

"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① 所以西汉时能自成一家之说的学派多并列于博士之位，由武帝的五经博士扩展到光武帝的十四家经学博士。古文经学虽未能在博士官学中站住脚，但也颇受统治者的重视。章帝"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② 古文经学家身居高位、参与官方学术活动的人为数不少。可见统治者是希望充分利用经学来为政治服务的，但统治者这种兼容和协调的政策也有利于各家经学的发展和融合。

在超越师法家法界限、兼通各家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归纳和比较的学术研究方式。贾逵集《今古文尚书同异》三卷，章帝十分欣赏，又令他撰写《齐、鲁、韩、毛诗同异》。许慎则作《五经异义》十卷。这些著作都不是站在任何一家的立场上，而是比较客观地将今古文经学各家的不同观点并列在一起，以供读者比较鉴别，它距离取长补短、实现经学的融合和统一，可以说只有一步之隔了。

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和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是汉代统治者协调和统一经学的两次重大学术活动。参加者既有各家博士，也有尚未立于官学的一些学派的学者。两次会议内容都是讲论"五经同异"，并由皇帝"亲称制临决"。在西汉师法家法严格、各家罕有相通的条件下，石渠阁会议还不可能产生统一的官方经说，主要是对当时各家经说进行检验和评价。《汉书·艺文志》记载石渠议奏，分经而列，共一百五十五篇，后来只是各自阐述自家经说而已。根据"扶进微学、尊广道艺"的原则，会议的结果是增立了四家博士（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东汉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出自杨终的建议："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③，就是要纠正由于墨守先师章句之学而产生的支离、烦琐的弊端。会议的议题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的旨意提出，经诸儒讨论，阐发各家观点，然后由侍中淳于恭归纳上奏，最终由皇帝亲自裁定。可见白虎观会议是以统一经说为宗旨的。会后没有再立新的博士，而是责成班固根据议奏和皇帝裁定的结论撰写《白虎通义》。既称通义，必定要贯通各家学说。《白虎通义》不是按经籍和学派类别划分章节，而是从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角度列出四十三个门目，如爵号、三纲六纪、礼乐、辟雍、丧服、五刑、耕桑、商贾等等，逐项用统治者肯定的经学观点加以阐述。《白虎通义》标志着涉及治国方针政策方面的官方今文经学理论的统一。

最终拆除学派藩篱，实现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是东汉末年卓越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学识渊博，遍注群经。他虽然比较倾向于古文经学，但并无门户之见，能够广泛采纳今古文各家经说的精华，并敢于断以己意，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经学体系。郑玄的经注广博、精要而又简约，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汉代经学集大成者。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论》中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的经注问世后，很快获得学术界最广泛的推崇，可谓"名冠华夏，世为儒宗"④，而原来的各家经说，则因后继乏人而衰落，以至湮没无闻。郑学成为汉学的代表，这就是清代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说的经学小统一时代。与《白虎通义》不同，郑玄不是靠官方的权威来统一经学，而是以自身博大精深的学术水平，来赢得天下学者的归宗。

---

① 《后汉书·章帝纪》。
② 《后汉书·儒林传》。
③ 《后汉书·杨终传》。
④ 《三国志·少帝纪》。

经学传授的主要形式——章句

章句是按照经籍篇章结构来阐述经籍内容及观点的经说形式。古籍本无标点段落之分，因此要理解经文的含义，正确的断句和分段是必不可缺的。章句即分章节、断句读之义，可能在早期的经学研究中即已出现。《后汉书·徐防传》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汉初，在搜集、整理失散的图书典籍的过程中，章句之学兴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自六艺焚于秦，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可见章句之学在纠讹补缺、恢复经籍的本来面目方面是起重大作用的。

章句实际上是经籍教学的讲义。经师按照经文的顺序，逐句逐段进行解说，形成固定的经说内容和格式。这种章句式的经说虽不如训诂和义理之说那样深入，但叙说流畅、层次清楚、结构完整，易于理解和记忆，又便于扩充和发展，所以深受教学双方的欣赏。朱熹说："汉儒说经，依经演绎。"① 就是指章句之学。汉代凡自成一家之说的经师必有自己的章句之学，以此传授弟子，所以章句就是师法家法的具体内容。《后汉书·左雄传》记载左雄提议选拔孝廉应当"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牋奏"，而《顺帝纪》中则说是"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应选"，可见章句与家法实际上是一回事。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最早成书的章句，当推《尚书欧阳章句》。后世家法分立，章句种类也越来越多，如《易》有施、孟、梁丘章句，《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谷梁章句等等。此外还有刘歆治《左氏章句》，张禹治《论语章句》，赵岐治《孟子章句》。章句之学一时成为学习和传授经籍的最通行的方法。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其经籍也采取章句形式传授，如严佛调撰《沙弥十慧章句》。甚至国家刑律也有章句进行解说。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汉律有"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章句之学在汉代可谓风靡一时。

章句之学有益于传经和释经，但随着经学教育的发展，它的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其主要表现是内容繁琐和形式刻板。

章句之学在内容上不受什么限制，只要按经文的顺序解说即可。从逐字逐句的解说，到对整段以至全篇内容的综述。经师在解说过程中，虽可以广征博引、进行详尽的考据和分析，还可以跳出经文的圈子阐述个人的心得体会。可见章句之学的容量极大。最初的章句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在分章断句的基础上略作解说而已。由于章句是师法家法的体现，后学者虽不能割舍先师的经说，又要力争自立成家，总是在继承先师章句的基础上极力扩充自己的经说内容，因而使章句的篇幅越来越长。以《尚书》为例，最初的欧阳章句只有三十一卷，与本经的篇幅大略相等，其弟子夏侯建则"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② 尽管遭到堂兄夏侯胜的责难，但终成一家之章句。到西汉末年，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③ 桓谭《新论》记载更为具体："秦近君（即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当然是极端的著例，但形象地反映了章句繁琐的程度。当时欧阳《尚书》最通行的牟氏章句有四十

① 《朱子语类》六十七。
② 《汉书·夏侯胜传》。
③ 《汉书·儒林传》。

五万字，桓荣为宫廷教师，将其减省为二十三万字，后其子桓郁又进一步压缩至十二万字，成为新的章句。即使这样，其字数仍五倍于本经。浩繁的章句成为学者沉重的负担，正如班固所说："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愚也。"①

章句之学按经文顺序逐字逐句进行解说，不重视经籍内容的整体联系，也难以突出重点和难点。夏侯胜、杨终都指出章句之徒"破坏大体"，班固批评墨守章句的说经者"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②，都是切中要害的评论。特别是章句作为师法家法的象征，更是从学派和门户观念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学者一旦陷入这种内容繁琐、形式刻板而又带有学阀气息的章句之学，无异于划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知识圈内。王充指出："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③即使毕生苦读，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既脱离现实生活，也不利于经学的发展。欲求博学和精思，就必须冲破章句之学的束缚，许多有造诣的学者正是这样做的，如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④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⑤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⑥卢植"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⑦这是他们学有成就的重要原因。

随着东汉后期师法家法及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各家章句逐渐衰微。郑玄所注各经均未采用章句形式，他的做法是："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⑧郑玄的经注简明扼要而有深度，某些篇目的注释比经文字数还少，一扫章句之学繁琐刻板的陋习，因此郑学受到广泛推崇。但是，章句作为一种治学形式，还是有其历史作用的，特别是在书本知识的传授活动中，它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后人仍在采用。宋代朱熹撰写《四书》章句，就是主要用于教育方面的。当今的语文教学以及经典著作的辅导材料实际上经常采用章句的模式。但是，章句的弊病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再现，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汉代经学教育的历史地位

汉代经学教育的昌盛，是独尊儒术的产物。"儒者以六艺为法"⑨，学习、研究和传授经籍，以经籍的内容观点作为立身处世和治理国家的理论工具，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儒术就是经术，尊儒必然尊经，只要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经学就必然是学校教育的主体内容，从汉代到清代均是如此。所以，汉代经学教育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模式，它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是教育宗旨的政治化。儒家倡仁义、讲名分，修礼乐、重道本，其学说本身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儒家的理想和抱负，"学而优则仕"是

①② 《汉书·艺文志》。
③ 《论衡·别通》。
④ 《汉书·扬雄传》。
⑤ 《后汉书·班固传》。
⑥ 《后汉书·韩韶传》。
⑦ 《后汉书·卢植传》。
⑧ 《毛诗·豳斯》孔疏引《郑志》。
⑨ 《史记·儒传》。

儒者成功之径，积累学识和培养道德的目的在于入官从政、治国治民。汉代置五经博士，将儒家经学教育正式纳入官方的轨道，同时广开察举之路，重用经术之士，使"学而优则仕"成为现实制度。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教育由教会所垄断不同，中国古代的教育始终为国家所控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校的培养目标是统治阶级的治国人才。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儒家经学本身的要求，又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一方面，经学教育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借助于政府的大力扶植而得以兴旺发达。然而，统治者以功名利禄诱使人们攻读儒经的作法，固然可以激发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不求学术真谛、争名夺利、门户相伐等弊病，汉代经学中的师法家法和今古文经学之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追求政治上的名利地位。此外，过于受政治局势和统治者意志的支配也干扰学术和教育的发展。相比之下，政治色彩较淡一些的私学和书院，其教学的稳定性和学术风气的浓厚程度，多优于一般官学。

二是教学内容的书本知识化。西周以前贵族学校教学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从形式上说，"六艺"均属行为规范和实际技能方面的培养和训练，书本知识学习占的比重不大。这种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仍无根本改变，所以有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① 的疑问和庄子借轮扁之口抨击所读之书为"糟粕"的议论。自汉代儒家经籍成为教育内容的主体之后，传授书本知识也就成为教学的基本形式。在经籍中，《易》记载占卦术，《礼》阐述礼仪规范，本属实际操作的内容，然而汉代以后也演变为以读书为主，形式上与学习《诗》、《书》没有什么区别了。学生的任务是读书，教师的任务是教书。从以行为技能为主的训练转向以书本知识为主的学习，在教育发展史上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适应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历史潮流，提高了认识活动的水平，也为建立正规的学校、统一的教学内容、严密的教学和考核制度奠定了基础。但专攻书本知识也带来许多弊病，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学习脱离实际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认识往往限于主观的判断和推理，而忽视客观的考察和实证。此外，死啃书本也容易导致教学活动的呆板和繁琐化。汉代的章句之学已经反映出了这些问题。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舞台上，经学教育占据了两千多年的主角位置，这与它既适应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又具有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经术是当时知识分子文化素养的象征，对社会风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古代的教育政策、制度和思想理论都与经学的研究和传授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经学教育作深入考察，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片面的。

① 《论语·先进》。